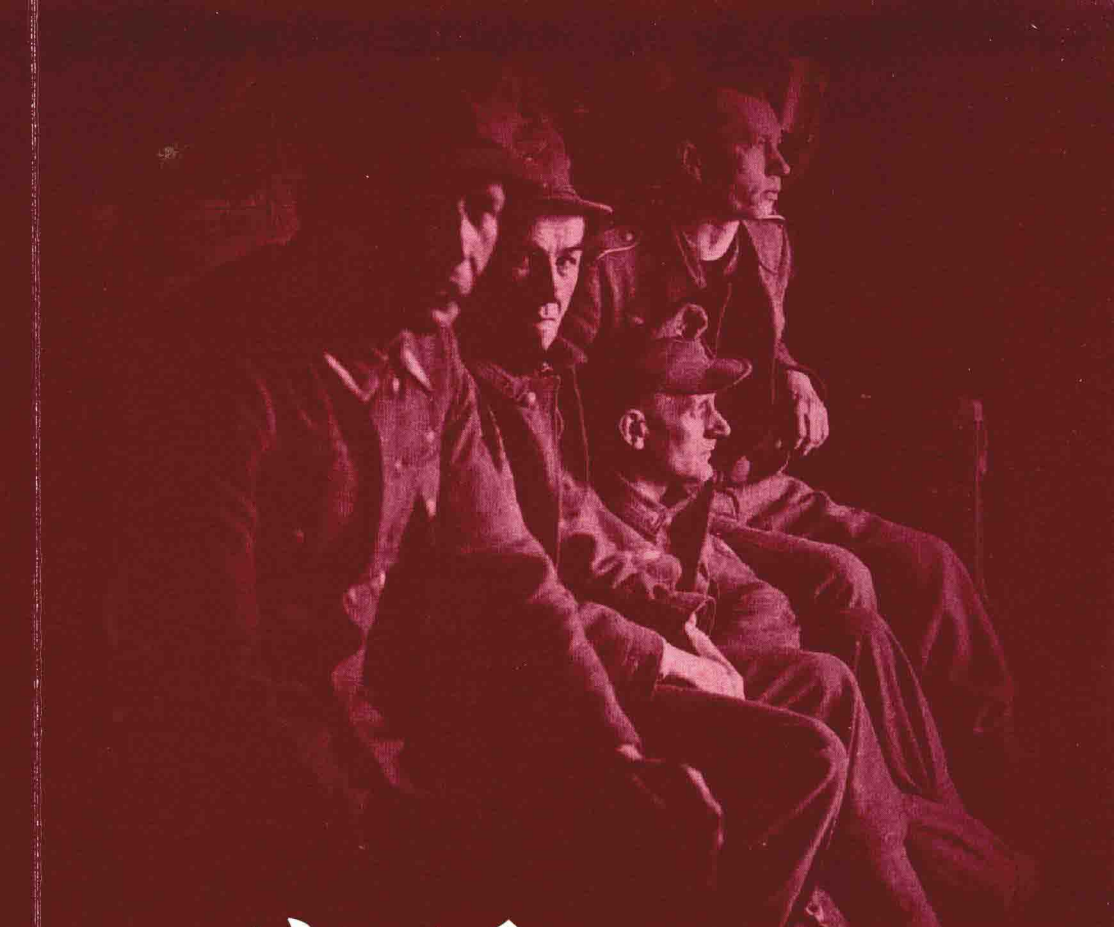




窃听

“二战”美军审讯营
秘密监听档案解密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von innen

[德] 菲利克斯·略莫尔 著 强朝晖 俞悦 高玉 译

Felix Römer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窃听

“二战”美军审讯营
秘密监听档案解密



[德] 菲利克斯·略莫尔 著
强朝晖 俞悦 高玉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 2012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本书原版权归德国 Piper Verlag GmbH 所有，其简体中文版权经由
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获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窃听：“二战”美军审讯营秘密监听档案解密 / (德) 菲利克斯·略莫尔著；
强朝晖，俞悦，高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
ISBN 978-7-108-05722-8

I. ①窃… II. ①菲… ②强… ③俞… ④高…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谍—
情报活动—史料—美国 IV. ① 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3981 号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 (中国) 全部翻译资助。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9

字 数 398 千字 图 30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 言	8
第二章 在战俘营	18
第三章 意识形态	48
第四章 军人伦理	93
第五章 战友情谊	134
第六章 军心斗志	175
第七章 部队长官	242
第八章 战斗与杀戮	280
第九章 战争罪行	341
第十章 结 语	393
谢 辞	403
注 释	406
参考文献	453

前 言

在“二战”中，那些成百上千万为希特勒卖命的德国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士兵究竟是谁？他们为希特勒争夺世界大国地位和攫取生存空间所发起的非正义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出身于纳粹独裁统治下由“雅利安人”占多数的社会的不同阶层，来自不同地区和教派。“二战”后，他们之中的幸存者获得了新的身份：企业家、工人、公务员或职员，还有从政者，甚至还有人又成了军人。

但他们首先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抑或是他们的兄弟、连襟。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今还活着，但生者是一年比一年少。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再不可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或感知他们的缄默。借由参战老兵或他们后代的口口相传，几乎每个非犹太裔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心中都还保存着有关“二战”中士兵故事的记忆片段。在社会学家们看来，除了“文化记忆”之外，这种通过书籍、电视节目和博物馆保存下来“用于交流的”记忆，也是我们关于战争集体回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究竟对自己那些手持武器，为一个非正义且近乎犯罪的目标而战的亲戚们了解多少？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思想和感受又认识到了多少？从我们的亲戚身上去找寻界限、探求身份和心理的矛盾，终归也

是对我们自身的探究与反思。面对那些亲爱的父辈们，我们去探索这些可能令人痛苦的过往，除了好奇之外，更需要勇气。

探寻路上的指示牌和里程碑早已剥蚀不清，让人无从判断。从留存下来的老信件和老照片中，常常找不到任何线索。那些战后文学中讲述的故事，我们固然能够理解却不相信，也不能去相信。趁着人还在世，当兵的故事可以一直讲到孙子辈。那些战后文学里通常只描述优秀的战士和关于冒险的小故事，而几乎不涉及战斗本身、死亡和犯下的罪行。这些内容显然被刻意地避而不谈并淡而化之，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来。“有罪”这个词更多是作为双关语普遍存在，并且在极少的瞬间得到加强。在这些瞬间里，选择性的叙述模式被打破；在这些瞬间里，尽管还会立刻被重新湮没，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片段迅速被唤醒，并通过语言和情感表达出来。

哪个儿女、哪个孙辈敢执拗地去问他们的老辈：你都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又做过什么可怕的事？你过去也是一名纳粹吗？长久以来，人们在关于德国国防军和“二战”问题的公众历史意识方面一直在兜圈子，这种行为于事无补。战后重建那一代人的集体良知，不应因为要对这场罪恶战争造成的伤痕去刮骨疗毒而受到侵扰。刑事追诉以及从科学、道德角度出发去评价的对象，多是那些主要的战犯，特别是纳粹党内和党卫队中希特勒最密切的追随者。而那些身败名裂的老派精英人士——他们之中有军官、外交官、政府高官、司法人员、科学家，还有企业家等——却在纽伦堡审判后不久就归于平静，社会名誉和地位也得到了恢复。纳粹独裁政权的大部分罪犯和帮凶都没有遭受到什么麻烦，其中不少人反而在大量文章、电影、讲演和小说等文艺作品的鼓动下，形成了一种受害者式的叙述口吻：一个叫作“希特勒”的恶魔带领他的小规模犯罪团伙，诱骗了“那些”德国人，并使他们遭到不幸。象征性的代表，就是那些被恶势力煽动参战、然后又被置之不理、“英雄般”承受痛苦并死亡的士兵形象。在这种战后主流文学叙事话语中，德国士兵不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事实，就这样被省略掉了。

德国史学界对于纳粹暴政的核心人物态度显得高贵而克制，对普通士兵这样的下层人物也并不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德国在“二战”中的集体犯罪行为和个人责任问题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历史学家们却在新兴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更加热衷于研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体制结构问题，而不是人本身。直到1995年，汉堡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巡回展览——“歼灭战，国防军1941至1944年间的罪行”，才满足了公众对于战争浅显易懂答案的需求。观展的人们受到了极大震惊，引发的讨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产生影响。这场由汉纳斯·黑尔（Hannes Heer）担纲的国防军展览同时也强烈地印证了：国防军整个变成了一座“行进中的屠宰场”，国防军全体士兵出于对纳粹的信仰，成批变作了战争罪犯和杀人凶手，成了纳粹的帮凶。即使后来那次展览因为发现有重大问题而被一个更新的严肃版本所取代，它仍持续地影响着国防军及其士兵的历史形象。这次展览还引发了社会、学界和家庭对此话题的广泛讨论。因为那次展览将过去的每个国防军成员置于质疑之下，它对观看展览和参与讨论的人是否弊大于利，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历史研究都会从公众辩论的推动力量中受益。这样的辩论诚然回答不了诸如有多少士兵曾参与战争和纳粹罪行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原本也不是从经验出发就能够解决的。然而，要寻找那些在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事形势影响下，将士兵的“通常”行为转化为侵害和过激行为的外部条件、感知方式和动机状况，也是困难重重。

和那些向自己家人追问纳粹历史的后辈一样，想要探究普通士兵的经历与心态的当代史学者也面临着原始资料的来源问题。由于军事档案记录的侧重点不同，从中获得的战后记忆只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结果，当时战地军邮要经过政治审查和自我审查，留存至今的战地日记也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能发现上万名德国（和意大利）战俘在被英国和美国关押期间的审讯和监听记录，实属幸运。

它将在对德军精英将领的充分调研基础上，带动新一轮对“二战”中普通士兵的研究。这些资料为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中的心态和扮演的

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些记录中，战友间相互谈论战争和各自的亲身经历，貌似对彼此互无防备，即使谈话对象彼此有个适应过程，也全无像对待战地军邮和面对家人时的那种顾忌。由历史学家森克·耐策尔（Sönke Neitzel）和社会心理学家哈拉尔德·维尔策（Harald Welzer）牵头的学者小组，着手对这些能产生轰动效应的材料进行研究。他们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由耐策尔和维尔策共同撰写的《士兵们——关于战争、杀戮和死亡的记录》（*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该书于2011年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大关注。

两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此书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但并不比那次国防军展览得出的结论更为准确。汉纳斯·黑尔和他的团队的出发点，是认为个体思想和行为受社会及其主导思想所决定的历史社会学观点；而耐策尔和维尔策则主要从军队集体化和社会心理学等角度进行论证。他们认为，国防军无休止的战斗行为更多是受当时士兵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和他们对它的直接感知等因素影响，而非纳粹思想。如果拿意图同客观情境两相对比，客观情境因素才是指引士兵采取行动的关键。因此德国士兵之所以成为战争罪犯，是因为他们是士兵，其行为符合“战争”这个概念范围，在其他类似状况下也会采取同样做法。士兵们的暴力乃至犯罪行为据此被解释成人类本性和普遍的下意识行为，是客观情境和社会力量造成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因素和对战争的事先认知只起到了“配角”作用。试想如果在战争的某个领域，士兵们真的始终保持同一种行为模式，就连实施罪行时也一样，那么这场由国防军发动的战争，包括他们在东线战场上最恶劣的行径在内，便都失去了它的特点。

简而言之，士兵们之所以成为杀人犯，一部分人认为因为他们是纳粹，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因为他们是士兵。这两种归纳性的解读给补充、修正及对其中差异性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挑战。对于存在缺陷的国防军展览来说如此，对于由耐策尔和维尔策撰写的、引起广泛反响的《士兵们》一书来说亦是如此。尽管该书的论证水平要高得多，但其太着重于立论

且观点又十分尖锐，因此也同样激起了反对的声音。目前，耐策尔和维尔策领导的项目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将这场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印证了这个团队的创新潜力和学术自信。

菲利克斯·略莫尔所著本书与《士兵们》一书完全不同，它是本完全体现个人风格和原创性的作品。菲利克斯·略莫尔的博士论文《专员的命令》获得学界的高度赞扬，并凭借此文成为对国防军最为了解的研究者之一；之后，他就开始为耐策尔与维尔策团队的书稿做必要的打磨、润色工作，不放过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一想到经此人之手完成初次评估的原始资料规模之大：超过10万页美国方面的审讯报告和监听记录，占了为“美因茨项目”所用的英美档案总量的2/3，并且还取得较好的成果，就更使人对他的敬意倍增。

本书的阅读方式有很多种——当然也可随时与其他同类内容相对照，以构筑整体印象。首先，这是本值得关注的书，书中德国士兵的自述内容新颖且非常引人入胜；其次，这本书深入透彻地讲述了大量从普通士兵到中下级军官乃至团级指挥官不同等级军人的思想状况；第三，本书还对关于国防军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权威性的总结。通过本书，读者能了解战俘的拘禁条件以及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亨特堡审讯营的有关情况，深入了解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人气质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更是了解有关牢房内战友关系和部队指挥官职责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能更好地解读那些士兵们对战争、战斗、死亡和罪行的感知及事实的阐述。对于那些在关于国防军公众讨论中有时只是浅尝辄止而没有深入回答的问题，作者从整体角度出发，给出了全面而多样的答案。菲利克斯·略莫尔对不同战场、武器兵种、兵团名称和军衔级别也进行了详细区分，唯有这样才避免了将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艇长、意大利战场上的空军飞行员和东线上的装甲掷弹兵等人的言行混为一谈，避免了那些用“战争就是战争”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消解的差异化；事实上，这些或广泛存在或故意而为的差异是因个人或集体原因而表现出来的。

对于上面提到的有关个人意图和环境因素哪个对“二战”德国士兵行为更具影响力的意见之争，略莫尔的观点基本处于中立。尽管他的这种看法并不像其他论点那么抓人眼球，却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士兵们关于战争的对话中可以推断，行为不仅只靠社会和客观情境中的普遍性逻辑控制，还有诸如文化烙印、社会行为样本及个人立场等因素发挥着影响力。士兵的行为空间是严格受限的，级别越低，限制就越多。可一旦预先设定好范围，行为的回旋余地反而会越来越大。如何利用这种余地，往往要看他们是否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遵守了“普通战争”的规则，还是把它变成了“歼灭战”中的犯罪通行证。菲利克斯·略莫尔这本优秀著作的最大成功，也许就在于把德国士兵作为有血有肉的行为主体呈现出来并加以分析，而没把他们纯粹当成客观存在或是毫无思想的机器人。在对叙述对象的重塑中，个性占了很大比重，还体现了他们在特定暴力实践中应负的个人责任以及各种特殊、差别化的责任。本书针对离开历史视野的战争罪犯们做了总结性概述，也纠偏了“战争就是战争”这样追求同一化和相对合法化的陈词滥调的观点。当德国士兵们的自述作为对他们思想状态和个人经历的反映得到严肃对待时，公平也就降临到他们身上——这些自述也是他们作为士兵，除了被动隐忍之外，也是他们主动参与，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

与那些曾经参加国防军或者武装党卫队的家族成员的坦诚对话，和那些为我们打开探究恐怖战争中人的心态和遭遇视野的对话，加深了我们对自己家人的理解，最终也是对我们自身的理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对话绝大部分读者没有经历过，也不可能再经历。更何况，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的不断累积，使得这种交流的认知价值被大大削弱……。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中那些如同多声部合唱般的叙述才显得弥足珍贵。从战俘们时常毫不掩饰的坦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些如临其境的描述，仿佛是从与当年那些士兵无缘进行的谈话中截取的片段一般。

本书将给我们带来两重收益。一方面促使我们对作者字斟句酌的表

述再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听到了那些男人们最原始的声音，而他们就可能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愿这两方面对读者朋友们都能有所裨益。

约翰内斯·许尔特（Johannes Hürter）

2012年8月，于慕尼黑

第一章

导言

库尔特叔叔是我未成年时见到的第一个总爱哭泣的成年人。库尔特叔叔其实是我的叔祖父，名叫库尔特·埃尔弗特（Kurt Elfert），同时，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国防军老兵。少年时代，我经常去探望他，我们一起下象棋，谈天说地。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祖父的影子。但是，有时仅仅一个词，比如说苏联，就足以让他由满面欢喜瞬间陷入莫名的苦闷。然后，他不再说话，浑身颤抖着，眼中淌下泪水。有一次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提到这个词，因为我弟弟弗洛（Flo）要去圣彼得堡做交换生。但是这个平平常常的词对库尔特叔叔来说却意味太多，于是，他一听到这个词，立刻面色大变，然后努力克制着情绪，试图让自己重新恢复平静。每一次，他总是讲不了几句，就泪水涟涟。很多时候，他都通过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和对苏联人民的同情，来让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战事本身。不过，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我永远都无从知晓。后来，我又见过其他老人在我面前哭泣。其中一个是我在弗莱堡军事档案馆遇到的，这位老人是去那里寻找自己的故事。然而，他的哭泣又与库尔特叔叔有所不同。在他痛苦的回忆中，既有垂死的战友和可怕的肉搏战中咬破颈动脉的画面，也有在东线战场上驾驶坦克的骄傲与自信。

但有些国防军老兵却从来不哭，比如我们的邻居君特（Günter）。干吗要哭呢？留在他记忆中的，都是快乐的事情，比如说与基尔警备司令女儿之间的风流韵事。君特原本想加入武装党卫军，但是却成了一名后勤兵，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上过一次前线。另外一个也叫君特的，是我家另外一个亲戚，他甚至在讲述战争场面时，也从不会哭。即使在讲到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如何在战争尾声的维也纳之战中射杀红军战士时，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

然而，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向我祖父询问他当年的经历了。我的祖父埃尔文·略莫尔（Erwin Römer）1939年9月应征入伍，1945年5月3日阵亡，时年仅36岁。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在1939年10月——入伍仅仅几周之后——申请加入纳粹党，¹也没人能够解释，他为何在战争行将结束的那个清早，在巴伐利亚州基姆湖（Chiemsee）畔的小镇瓦京（Waging）丢掉了性命。瓦京医院的死亡证明上除了“失血致死”（阵亡）之外，没有其他说明。²在当地教区纪事里，也没有任何有关这一天的交战记录，而仅仅提到了一次在夜间误发的“教堂钟声警报”，以及在场的党卫军部队与其他国防军部队之间的“严重争吵”——事涉应不应该继续留守的问题。³美军第一支部队到达瓦京的时间是1945年5月4日的清晨，恰好是埃尔文·略莫尔刚刚离世的时间。⁴除了他的军人墓地之外，还有几个干巴巴的数字，周围人对她的一些粗略记忆，以及一直放在我祖母房间的穿着制服的肖像照，有关他的资料已所存无几。

相比而言，我的外祖父则幸运得多。他留下的痕迹，也比我祖父多得多。我的外祖父维尔纳·兰普（Werner Lamp）生于1904年，是后备军的一员，开始他是在东线战场服役，后来去了非洲。1943年5月，他在那里被俘，并以此结束了他的“战争”生涯——他甚至没有打过一次仗。与我的祖父不同，外祖父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因为在战场上，他几乎每天都给家里写信。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外祖父为能够穿上国防军制服深感自豪，并且打心眼里“感觉自己是一名军人”。⁵他在信里称呼他的小儿子是“伟大的士兵战友”，⁶他认为自己在距前线一公里远

的后方所做的是“一个美好而充满责任感的工作”。⁷他强调说，他“很喜欢在这里做事”，⁸这也是因为他“和战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⁹的主要原因。军人精神、义务观念和战友关系——这些是维持纳粹军队运转的最大动力，我们在本书中还将不断地观察到这一点。而政治路线上的忠诚，在这里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这位来自汉堡阿尔托纳区（Hamburg-Altona）、信奉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人智学的国防军老兵身上，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这种政治忠诚的存在。在他富于爱国情怀的家庭中，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真是形单影只。与他反差最大的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一个：弟弟赫尔曼（Hermann），他完全被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洗脑了。1941年10月28日，维尔纳与赫尔曼在东线某地的战地影院不期而遇——在漫无边际的战场上，兄弟俩的相遇是一次意外的惊喜，两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开心极了”。¹⁰为了定格这次偶遇，两人拍摄了一张纪念照。

这是一对境遇悬殊的兄弟：赫尔曼身着精英坦克部队的特殊制服，翻领上有铁十字勋章，胸前别着重伤勋章——这两个标志是在向每个人展示其佩戴者在战争中获得的荣誉。相反，维尔纳的空军制服非常朴素，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勋章。尽管他身上不乏军人气质，但是从他的站姿可以看出，与身边面容严肃的弟弟相比，明显逊色了不少。这张合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国防军内部巨大反差的真实写照。

这些来自我家庭的几位国防军士兵，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独具特色，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就是个人经历与“二战”所走过道路的多样化，以及经验、命运和自我反思方式的差异性。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德国和奥地利家庭中，都能找到一个与此相似的多样化图景。我们在本书中还会经常遇到这一基本模式：国防军的构成是复杂多元的，正如招募这支队伍的社会一样。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差距之大，可以导致完全相反的士兵生涯。为此，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对比鲜明的例子。有时，这一点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家庭中得到反映——就像这对悬殊巨大的兰普兄弟一样。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家的两位国防军



插图 1：东线战场上的偶遇，摄于 1941 年 10 月 28 日

老兵对待自己战争经历的态度也是迥然相异。其中一人在当兵时就已习惯了暴力行为，在战后也能平静对待这些回忆；而另一个人却对战争始终无法释怀。但是，导致我们对两位家人的战争经历理解不同的原因或许也在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实在太少。祖父埃尔文从开始到战争结束，除了几次短暂中断外，几乎一直在国防军服役——但是除了他最初所在的部队和最后的军衔之外，别的我们就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外祖父维尔纳从战场寄给家人的信件大都被保留下来，但是他在信中写给妻子的只是一些日常的琐事。仅仅是通信本身，便已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兴奋地写信和读信，信件及包裹的发送和收取；还有，就是远在家乡的三个孩子，以及在汉堡遭到频繁空袭的时候，他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担心和挂念；最后是在国防军的服役生活——“工作”，“活动”，“战友”，伙食，福利，“大自然”，以及闲暇时的“散步”。战争真正包含的东西，他却只字不提——人们丝毫不会注意到，这些信是寄自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中。这就是战地通信的特点：士兵们写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他们之所以写信，更多地是为了能够短暂逃离前线生活，为了能够在写信的那一刻让自己的意识重新回到家人身边，并从家人那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他们在信件中，会有意回避那些有可能引起家人不安的话题。在维尔纳·兰普写给妻子的信中，反复出现的内容就是：“你真的不用害怕”，¹¹“不要为我担心”。¹²审查和自我审查所导致的结果是，作为史料之一种，这些战地通信所提供的信息价值是有限的。对士兵来往信件进行检查的军队邮政检查站，也早已注意到这一点。甚至在东线战事最紧张的那个月——1941年12月——审查人员在对几千封信件进行检查后得出结论，“大部分信件（93%）的内容都平淡无奇”。¹³所有信件几乎都是“对来信的回复，里面提到的只是家庭或个人的私事，或是对生活状况、驻地环境的客观描述。信中没有一句提到写信者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或能让人从整封信的内容推测出写信者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些特点与我外祖父维尔纳·兰普绝大多数战地邮件的内容完全吻合。在战地通信中，士兵们描绘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收信人是谁。这一特点在战后库尔特叔叔的家中依然很明显。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在东线战场作战——他对这段经历的讲述，往往会随着谈话对象的变化而变化。¹⁴在大范围家庭聚会的时候，比如说过节，他喜欢讲一些战场上发生的轶闻趣事。而他所讲的，几乎都是关于开小差或是发生在战友身上的糗事。而面对最亲密的家人，例如，两个女儿，他会跟她们讲述一些相对沉重的经历，常常讲着讲着就情绪激动得难以自己。在儿子面前，他总是有意识地选择轻松的故事版本——在父子之间，关于战争的话题从来都不会展开，所以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在讲述战争时情绪失控的样子。同女儿们不同的是，儿子自始至终都对父亲从苏联带回的精神重负——伴随他一生的噩梦，偶尔发作的吗啡瘾，还有无法克服的对森林的恐惧——一无所知。甚至对自己的女儿们，库尔特叔叔往往也会及时中止谈话。只有在他的妻子葛楚（Gertrud）和我的面前，在谈到苏联的时候，他才会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这些便导致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位成员对战争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些版本中，哪个版本更接近库尔特叔叔在当兵时实际经历的战争，没有人能够判断。回忆总是发生在当下，并随着时间流逝和需求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往往不可信。

此前，所有的文献只能为我们提供了解国防军内部的有限视野，因此眼下这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堪称是一件幸事，它比以往其他任何类型的史料都能更接近真实地再现国防军士兵的心理状态：这就是“二战”盟军审讯营的秘密监听记录。从1939年起，英美盟军开始运营这种特殊的拘押营地，他们在里面通过隐藏的话筒偷听德国战俘的对话，并把它们记录下来。关于数千名普通国防军士兵的窃听记录和审讯报告加在一起，厚厚一大摞，远超过了10万页。这些原始资料构成了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范围最广泛的“二战”德国士兵自述。从信息价值之大来看，盟军审讯记录堪称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国防军意识形态史。

如我们所见，战地通信常常有检查和自检之嫌，而私人日记只能出